



# 我的高考

□黎强

我是在县城工业系统的子弟校工交中学读的高中，那时，只有高二年级。高二年级一毕业，就面临高考。那时俗称“过钢板”，意即，是骡子是马，都要在烧红的钢板上走一遭。

## 1 六七十个同学只选上两个 每天在老师办公室里上课

临近高考前的一学期，几乎是在死记硬背、文山题海中度过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要什么有什么，做不来的题，电脑上、手机上、平板上搜搜就出来了。那时的高考，是需要预考的。我记得全班（包括插班生、复读生）六七十个同学，预考后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周同学（后来在某军工厂工作，江津籍知名画家），每天上课都在课任老师的办公室里进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准考生，开一间教室没有必要。那时，真让同学们羡慕。我的父母亲也很高兴。

## 2 全村都晓得我读书得行 邻居送鸡蛋要母亲为我补身体

高考前一阵子，左耳是父亲母亲“好好复习，闪不得劲哟”的唠叨，右耳是亲戚街坊“努把力，过了这关就好了”的絮语，整个人完全是晃兮晃兮的，想真正放松下来，其实很不容易，压力之多之大，不比现在的孩子好到哪儿去。

在河坝街，挨家挨户都晓得我读书得行，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的学习榜样，说自己娃儿，你看那个吃没吃啥，穿没穿啥，读书好凶哟。邻居李二娘还专门给我送来十个鸡蛋，说让我母亲给我补补，好金榜题名。王伯伯喜欢在河边搬罾捕鱼，每有好的鱼，就给我送来，让我母亲熬汤给我喝。

## 3 父亲为我买卤兔脑壳 母亲一早做“一根筷子挑两个鸡蛋”

高考头一晚，父亲破例没有醉醺醺地回来，拉了一根长板凳，父子俩坐在一起，从破旧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卤兔脑壳，说，这个给你，明天好好考试。少顷，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在说，你爷爷大字认不得，我也没有啥文化，你妈妈更不消说，家里没有出过大学生，明天就看你的啦。说完，才自己在碗柜里摸出酒瓶子，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独饮，没有再说什么话了。

第二天，我很早就被母亲叫醒，看样子父亲也很早起来了。考试需要的东西，都一一给我放在饭桌上了。母亲故作轻松愉快，从灶房里端来一碗温度刚好的荷包蛋，白白生生的好大两个，对我说，趁热吃，一根筷子挑两个鸡蛋，肯定考100分。那时，不是太懂得大人的心情，吃得快极了，滋溜一下抹抹嘴角，拿着考试必备的东西，走了。老县城的路街，七弯八拐的，要走到考场时，无意间回头，只见父亲离我不远不近的。父亲看见我发现了他，迟疑了一下，折进旁边的另一条巷子去了。

## 4 端小板凳坐在街口黄葛树下 等送高考成绩单的邮递员自行车铃声

高考之后，盼的就是成绩。父亲母亲已经数十次问过我的自我感觉，“你到底有把握没得哟？你到底把题做完做对没有哟？”这类让我不敢肯定的问题。临近发通知那几天，我上午下午哪里都不去，就端一张小板凳坐在街口那棵黄葛树下，听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铃声一响，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那几天的心，真是七上八下的。八月中下旬的某天，我终于等来了邮递员喊我名字的那一刻，是考试成绩单：语文89，数学38，历史71，地理73.5，英语19……一看，就知道我的大学梦破碎了。

流着极度伤心的泪，我转身回家里，把成绩单递给母亲，母亲没有说一句话责备的话，说，晓得下学期复读要好多少钱哟？空了我去问问呢。母亲想宽我的心，但我知道家里实在不富裕，哪里有宽裕的钱让我复读呢？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亏欠父亲母亲。

我向母亲要了10元钱，去了四面山深处，哥哥在那里的。在四面山，我去往贵州背炭、去给刚刚改伐的船板打印、去原始森林看伐木工采伐原木、写出平生第一首诗歌。从此没有在父母面前提过一句想读书，哪怕我内心非常渴望读书。

到现在，我都把自己的每一次自学，当作我对高考失利的惩罚，非常用心。通过努力，我在人生的路上没有落伍，做出了一些小成绩。特别是我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恭恭敬敬递到父亲手上时，父亲看我的眼神，放着炯炯的光，但湿漉漉的……

（作者1980年参加高考，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重庆市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金融作家协会会员）

# 老方

□朱孝才

1982年，我警校毕业到公安局刑警队报到，第一个遇到的人是副队长老方。

队长办公室没人，有人指了指技术室的路。技术室在公厕边，破破烂烂的，常有外面办事的人走错路，把技术室当厕所了。我进门，老方正趴在桌上用一个缺了一个角的三角板画现场图，头也不抬说：“厕所在旁边。”我连忙递上一支当时绝对高档的重庆牌香烟。老方抬起头，认真看了看烟卷，脸上堆起了笑。听说我是来报到的，笑得就更灿烂了。他不笑不打紧，一笑，脸上瘦巴巴的皱纹立马成了两个大大的括号。“我姓方，方少雄，叫我老方吧。”老方忙不迭说。

老方是队里绝对的业务骨干，真正的“全跨子”，上上下下都服他。只一条不好，人太抠。老方老家在乡下，爱人刚农转非进城，在一家要死不活的厂子上班，两个娃儿正上小学，日子过得很是紧巴。老方烟瘾特别大，每月工资交了爱人，烟钱就只能在一天四毛钱的下乡补助里省。大家打堆，烟是轮流着散，轮老方，总溜一边儿去了。我们都理解他的困顿，偶尔给他塞个一包两包的，老方也不推却。遇着派工派活，他这个副队长该咋样还咋样，从不照顾。

两年后我调地区公安处，没多久就听说老方得了肝癌。我心里发毛，想老方早几年黄皮寡瘦的，可能早就有了病根儿吧？忙去医院看他。老方手里捏着支没燃火的香烟半躺在床上看一本叫《霍元甲》的小人书，翻两页把烟凑鼻子下闻一闻。抬眼见我，老方丢下书要下床，我急忙伸手按住他。我递支烟给他，他闻了闻，夹耳朵上了。临走，我掏两包甲秀香烟给他，附耳说：“想抽了，去厕所。”老方嘿嘿一笑，把烟塞枕头下了。我们握手告别，他的手很凉，鸡爪子一般。

转眼到了春节，老方去世了，遗体告别仪式在“三根桩”举行。县里的火葬场在市郊三公里，万县人管它叫“三根桩”。刑警队法医老张和殡仪馆人殓师一起给老方换衣服、整理遗容。地区公安处破例下拨了一套毛料警服给万县，让生前没资格穿毛料制服的老方死后享受了这个特殊待遇。老方瘦成了皮包骨，肚子却挺得老高，老张费了老大力气才把一颗颗金灿灿的警服扣子给他扣上了。我们一起整理老方的旧警服，口袋里掉下半包皱巴巴的甲秀。看到这半包烟，我哭了，大伙儿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我不忍久待，匆匆回城。走出一里地回头望去，“三根桩”上空飘起一团团淡淡的青烟，随着哀乐声袅袅升起，汇入了无边无际的湛蓝色天空……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老街的心

□李晓

初夏的一天早晨，傅哥沿着万州五桥老街的小巷慢慢地走，他摩挲着巷子里已发白的青砖，轻轻一拍，有粉尘簌簌而落。老街的这些民房有五十多年了，有的比傅哥年纪还大。

差不多每天，傅哥都要在老街的街巷里走一走，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街巷里的角角落落，触满了从他脚下蔓延出的根须。要是哪天没看到他的身影，街坊们都要给他打去电话问上一句：哪儿去了啊？

傅哥是老街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上任已16年了。那年，老街坊们在社区门口簇拥着他，对这个老街长大的娃表示祝贺。老街人早就盼着这个在外面做大生意的娃回来领着他们一起干。

老街的街道，家里客厅一样干净，老街的巷子，幽静清爽。老街人说，傅哥干得好啊。老街的河流两岸，一年四季开放的三角梅、格桑花、菊花，让老街氤氲在花香里。我每次去老街，都要陪河边的花多坐上一会儿。老街的这些变化，都是傅哥带领老街人干出来的。

但这些年，老街愈发清静了，在它旁边，是矗立在云天里的高楼，老街的百年石拱桥边，是一座高速路上架起的立交桥。我有时坐在老桥上望着立交桥上呼啸而过的车辆，陷入时光穿越的恍惚。

生活在老街的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居民，还是愿意守候着老街。比如我妈，我劝她跟我们到新城居住。我妈说，我能跟你们去吗？要不你把老街的黄葛树一棵搬走算了。我妈的一句话，就把我的话堵住了。那棵绿云缭绕的黄葛树，老祖母一般安详地扎根在老街已达百年，一圈一圈的年轮，铭刻着老街的肌理。

老街人舍不得走，其实也是舍不得傅哥。老街的樊大哥说，傅哥也是老街人心里的一棵树。这一片共有的荫凉，当然也是老街人一同撑起的。

三年前的夏天，天空撕开了一个巨大窟窿，厚厚云层里倾泻而下的特大暴雨，让平时温顺的河流突然咆哮暴涨，滚滚河水高昂着头，漫过了黄葛树的树冠。傅哥带领着抢险救灾人员紧急疏散了数千老街居民，志愿者们暴雨如注中敲打着铜锣，呼喊着老街巷子里还没撤退的居民。那天上午十点，河水淹没了老街全线，全身泥浆的傅哥站在老街高处，看见浊浪滔天的楼顶有几个还没撤离的居民打着手势惊恐地呼救，傅哥就从老街桥头纵身一跃，从激流中攀爬上楼，先后营救七个居民。这一次救人，傅哥是用自己的性命作了赌注，幸亏他体力与水性极好。这一幕，正好被蹲守在老街报道抗洪救灾的电视台记者小何拍下画面，三天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傅哥救人的新闻，老街人噙着热泪看到了这个新闻。

电视台记者小何也是老街长大的娃，有天晚上我与他坐在老桥上，沉默之中，听着桥下河水潺潺，小何在夜幕中对我说了一句话：“李哥，我觉得老街是有心的，我与它的心是在一起跳动的。”平时感情内敛的小何，那天说出的这句话让我惊了惊。而今，小何的父母也住在老街一栋灰白小楼里，在老街的烟火袅袅里过着油盐酱醋的世俗日子。逢年过节，这个城市里的人像大鸟一样张开翅膀奔赴天南地北的故土老家去喂养一颗嗷嗷待哺的心，小何与我要共同陪伴的，是这个长了一颗心的老街。

（傅哥真名傅山祥，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2021年6月，被中共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3年1月，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